

我们的路

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
重庆市文艺工作团

回忆录 4



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队史研究会
重庆市文艺工作团团史研究会

我们的路

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
重庆市文艺工作团

回忆录④

主 编 阎 彬
副主编 李之杰 曹明舒
王建武 孙士平
宋晓涛

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队史研究会
重庆市文艺工作团团史研究会

中国人民解放军
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

重庆市文艺工作团





责任编辑 宋晓涛

装帧设计 薛 菲





编者的话

《我们的路》回忆录第四卷又与大家见面了。

去年6月15日,“2012年年会暨《我们的路》回忆录发行大会”在皇侨大酒店召开,老战友们欢聚一堂,欣喜地得到了《我们的路》1-3卷。这一套三卷集回忆录的印刷发行,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。其稿源主要两个:一是将以往的回忆录集大成(1985年孙士平、朱龙渊、张继楼、孙简文、黄功楷、曹明舒等整理的《队史》、2003年胡度主编的《斑斓岁月》、2009年阎彬主编的画册《艺苑六十年》);二是重新组稿(李之杰只身从山西专程来成渝两地组稿两个月,动员老同志和“戏二代”撰稿)。这套三卷集的编辑工作主要由李之杰同志承担,由于他的顽强拼搏,以及山西教育出版社一些老年、青年朋友和其夫人王月花的襄助,我们才能收获177万字的三卷集(附一小本)回忆录。

本来,并没有这么快就编印《我们的路》第四卷的打算。

当初在编印三卷集时,由于时间紧、任务重、人手少,出点差错在所难免。比如,已经照排印刷了,才发现遗漏了文稿。作为补救措施,经编委会紧急商议,补

印了三卷集中附带的那一小本,将遗漏的8篇文稿补入。实在有些对不起!

但遗憾的是,事情并没有因此了结,因为又有同志提出遗漏了他们上交的文稿,这就让我们十分自责和纠结。

怎么办?如何补救?编委会召开了多次会议。最后决定:马上编印《我们的路》第四卷。

主要出于两个原因:一是“补漏”,即把全部漏稿编入第四卷;二是“补写”,重新组稿,为没能纳入回忆录的二十多位老同志(包括老领导)撰写稿件。因为只有这样做,《我们的路》才能成为一套比较系统、完整的回忆录丛书,无愧于历史。

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,在大家的支持下,现在,《我们的路》回忆录第四卷终于与大家见面了。

但依然有遗憾,由于这样那样的主客观原因,仍然有一些老同志没有文章。但是,我们努力了,我们尽量地减少了这种遗憾,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谅解。可贵的是,《我们的路》第四卷在编写过程中,采集到一些珍贵的史料,其中既有老领导同志高风亮节的感人事迹,也有亲密战友让人扼腕痛惜的冤假错案,还有老同志们充满诗情画意的才艺作品。我们以文图的形式一并收录于此,为的是记录和展示历史的真实,显示历史的宽阔、丰富和深沉。这也使第四卷更富于可读性、史料性,从而使《我们的路》这套回忆录丛书更具收藏价值。诚如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批示所言:老同志的辛勤工作,为我们保留了一大笔宝贵史料。

应该说,这件为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、重庆市文工团收集史料、抢救历史的宏大工程又告一个段落了。我们仍然采用前三卷“编者的话”之结束语——

我们从历史中走来,又将回到历史中去。让我们留下这段历史,珍藏在记忆的深处。

《我们的路》第四卷编委会

二〇一三年四月三十日

目 录

难忘啊难忘——悼念任白戈同志	
..... 李庆昇 张 莺 张 炜 徐九虎 石 玺 石 曼/1	
我的选择	田晓东/4
我的遗嘱	田晓东/8
田晓东同志逝世	《三峡都市报》/9
特别的悼念	郑 艺/11
父亲田晓东	田 惠 田 流 田 稳/13
我们当年在孩子剧团	张 莺 曹克冰 胡 杰/14
抗战血泊中的一朵小花	肖明镭 饶 蓓/23
他们还活着	陈 飞/25
我是孩子剧团的战士——记吴依同志	陈 飞/29
吴毅同志生平简介	市文化局/31
邓小平听吴毅的《打过长江去》	史 超/35
战友们怀念“老吴毅”	战友信件/38
二野文工团战友谈吴毅的音乐作品	江 涛 郭 民 徐怀中等/40
艺术家们深情怀念吴毅老团长	吴晓琴整理/42
怀念音乐家吴毅同志	宋祯柏/50
永远怀念我亲爱的父亲——吴毅	吴晓鸣/53
回忆我尊敬的父亲——吴毅	吴晓洪/57
吴毅——我敬爱的父亲	吴晓玲/59
忠诚的战士 人民的音乐家	吴晓琴/62
宋清湘同志生平	/80
清湘,我永远怀念的爱人	李毓敏/82
感恩,思念亲爱的爸爸——宋清湘	宋 东/85
永远怀念父亲	宋 聪/86
著名魔术师阮振南纪念会	87
纪念著名魔术师阮振南	杨少元/88
一张特殊的相片——魔术师阮振南平反记	阎 彬/90
难忘的第二祖国——记魔术师阮振南	通 讯/93
黄埔奇兵	朱龙渊/95

越南故乡行	阮树华/97
画梅六十年	朱宣咸/101
朱宣咸生平	/102
时代性,社会性,多元性与精神性	朱 澄/104
艺坛片语	/111
从投枪匕首到纯情艺术	林 木/116
朱宣咸不是一个书斋中的画家	通 讯/119
张民权简介	重庆国画院/121
我的父亲上戏了	张 莺/122
丹青不老	周顺恺/126
悼张炜	崔 轼/129
忆陈岚	靳 隐/132
忆张展同志二三事	曹明舒/134
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——忆张展同志的表演艺术	王卓云/137
忆李平同志	戴启煌/141
永远的思念	郭小津/145
看清涛剧作《一个美国将军在重庆》有感	赵 锵/150
春来花枝俏——看《一个美国将军在重庆》	杨 山/152
结缘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广才	苏 瑗/154
田广才艺术简历	田广才/157
求艺无垠	王建武/160
朴素·明朗·含蓄	石 玺/172
我创作编导双人舞《小萝卜头》的事儿	毕西园/176
我与戏剧有缘	陈宝辰/179
我们的炊事班	阎 彬/183
幕后春秋续篇	曹明舒/190
激流浪花	臧鸣亚 王 燮/195
他,谱下了川江最强音	陈 莉/207
心血谱写生命乐	陈 维/213
音乐之树常青	肖鸣锵/215
作曲家金干作品音乐会节目单	/217
路	曹延彬/220
秀山花灯映像	何良荣/223

我的艺海之路	郭鸿替/230
奇异的恩典	李景仙/237
从事音乐文化一生 《延讲》是指路明灯	江雪梅/248
我跟唐福生先生学作曲	王劲楣/252
我行天山路 情归琵琶缘	王劲楣/255
色彩鲜明的罗马里亚民间音乐	文 纪/258
我的老伴文纪	白小平/261
我的父亲文纪	罗雯文/265
悼石曼	《红岩春秋》杂志社/270
悼石曼	安 琳/272
忆石曼	沙 漠/274
冷雨迎“春燕” 热风送君归	刘子茵/281
写给爷爷	张 静/284
我该怎么对你说,石老师	连小培/286
话剧史家石曼的学术成就	曹树钧/288
谈话剧《家》的演出	曹 樱 蔡 炎/294
曹樱生平简历	/297
蔡炎生平简历	/299
纪念我们的恩师——蔡炎	流星话剧队/301
青山依旧在——怀念我的老师吴世珏	宛庆钰/303
冯维的最后冲刺	李侍琴/308
怀念我的父亲冯维先生	冯 蓉/313
怀念我的岳父冯维先生	唐玉友/316
我们的妈妈刘堃	朱大明 朱晓虹 朱晓佳/319
我们的爸爸肖洙	朱晓虹/324
阑珊岁月艺海行	谭 健/327
回忆我的父亲母亲	唐 军/332
我的青少年及退休生活	孙 轲/335
默默耕耘 30 载 歌曲创作喜丰收	罗 汉/342
从文艺转战石油	张积强/344
最大的遗憾是浪费了人生	王志坚/348
有关青年演出队的那些事	陈宝辰/351
错位人生	陈友功/354

肖培禧白熹	肖氏三姐妹/367
艰难的成长 无私的爱	段 焰/372
难忘的激情岁月	王志坚/378
我的一生	靳 隐/381
在人生道路上	袁 路/385
我与玉兰	孙简文/402
人间真情 天长地久	孙 川 孙鸣苏/424
前进在解放西南的征途上	龚 麟/431
干革命要忠诚老实	俞 白/437
追记红色历史 重走革命之路	阎 彬/439
寻觅战友毕传泽	阎 彬 宋晓涛/446
吾师毕传泽	郑尚谦/473
我父母眼中的毕叔叔	吴小枚/476
关于毕传泽的记忆	唐 维/478
毕传泽同志活在我心中	杨俊才/480
幸福的童年	姚 炜/483
父亲教我学游泳	姚 磊/487
揭开尘封的记忆	姚念劬/489
刻在心底的童年岁月	姚 炜/496
我们的申诉	姚 炜 姚磊 姚蔚/501
无畏女性的风雨人生	王地山/504
人治时代的童话	俞继璋/506
回忆战友孙谋定	朱文冲/536
深切怀念黄静瑜同志	曹 明/540
五十周年聚会	李石麟/543
一帧珍贵的历史老照片	阎 彬/545
华岩古刹 追思战友	阎 彬/548
2012 年年会暨《我们的路》回忆录发行大会简报	/553
回忆团史研究会成立 20 周年老战友演出	阎 彬/571
小话剧《妈妈的微笑》	王建武 陈 飞/577
战友捐赠名录	/586
1-3 卷勘误表	/587
后记	/594



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

难忘啊！难忘！

——悼念任白戈同志

□ 李庆昇 张 莺 张 炜
徐九虎 石 玺 石 曼

一九八五年“重庆雾季艺术节”开幕式的主席台上，中国老一辈戏剧家云集，会议主持人把他们一一的介绍给到会者，会场上响起一阵又一阵掌声。当说到这位是任白戈同志时，会场上的掌声愈响愈烈，长时间停息不下来，这颇使一些不太了解个中原由的人们惊讶。是因为任白戈曾经长期担任重庆市委书记、重庆市市长的关系吗？这不是主要的。主要的是，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，他是重庆文艺界人士的良师挚友、知心人，他为重庆文艺团体结硕果、出人才，长期地灌注了大量心血。老人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尽力地睁大了他那疲劳了一生至今仍带着红丝的眼睛，衰老的面庞泛起了几乎难以察觉的笑容，他吃力的微微地抬起手来摇动了几下。会场上的掌声又掀起一阵新的高潮才渐渐的平息下来……这是十年浩劫之后，重庆文艺界和任白戈同志一次最广泛的会见、最欢乐的会见，没有想到，对绝大多数同志来说也是最后的会见。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三日，任白戈同志与世长辞，竟和我们永别了！噩耗传来，引起我们极大悲痛。难忘的往事，却像清流中五色斑斓的石子，在我们脑海中更加明晰的显现出来。

难忘啊，难忘！一九五零年，破败不堪的抗建堂由重庆市文工团接管过来。戏剧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剧场，这是在旧社会干戏的人多少年来朝思暮想的愿望。填

平了地上的坑洼,扫除了墙上的积垢,我们尽力把剧场装扮了一番。一天早晨,任白戈不请自来巡视了剧场。我们发觉后才迎了上去。任白戈指着那一排排破旧的长椅子说:这样不行,既是欣赏艺术,就要让观众坐得舒服些。他立刻批了张相当于现在两万元的条子,把座椅全部换过。我们没有想到的,他想到了;能办到的立刻就办。不搞旷日持久的“研究研究”。他心中装有艺术,装有人民。

难忘啊,难忘!建国以后的十七年间,市话剧团有《四十年的愿望》、《嘉陵江英雄歌》、《红花朵朵开》、《苦水甘泉》、《比翼高飞》等剧的创作,哪出戏都有任白戈耗下的心血。其中有的剧本,他还提交给市委常委会讨论,请市委书记们发表意见;他或亲自提笔修改,把作者请到他的家里,他和作者一起熬夜到天明,作者饿了,他拿出准备好的点心;作者累了,他泡茶拿烟,全无当官的架子,充满同行情趣。他对剧本的语言要求尤为严格,常说:“要筛掉糠花,要字字珠玑。”他常常和我们一起筛糠壳、刨珠玑。包括对我们请团外作家写的《红岩》、《重新报到》,都是这样。

难忘啊,难忘!十七年间,话剧团演出剧目上百数。对这些剧目,任白戈只要在重庆,排演他来看,彩排他来看,正式上演他更要亲临剧场。请他,他要来;不请他,他也要来。对《四十年的愿望》、《尤利斯·伏契克》、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雾重庆》、《比翼高飞》更是如此。每看戏,必发言;有批评,有鼓励。大自戏的立意,小至一句台词,他都发表过意见。他不自以为是,不以为官大意见必正确。看演出时,他常常在看观众的反应,这一处观众为什么入迷,那一处观众为什么散神,用演出效果来检验自己对艺术的看法。他还热心的替剧团征求意见,或口头或信函转达给有关同志。他无愧是我们的良师,无愧是我们的挚友。他知道我们每个人所长,又了解我们每个人所短,知人善任。他常说的关于培养人才的话,我们铭记在心。“剧团不是培养小组长的,要出艺术家!”“是人才就要用,不要把他捏在手里,既不用又不放,就把人才捏死了。”

难忘啊,难忘!在贯彻“百花齐放”方面,任白戈做得也是比较好的。一九五六年,市话剧团排《雷雨》,引起一些人们的非议。有人说:“这种母子乱伦,兄妹恋爱的戏,也搬上社会主义舞台。这叫什么话?”任白戈对我们说:“讲这种话的人,水平低。要多做宣传工作。”并且指出“繁漪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。”六十年代,我们排演《卡门》,正逢上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提出之后,极“左”升级。有的领导同志说:“现在我们还演这种戏!”任白戈临危不乱,他说:“一九三零年,南国社就在上海演《卡门》,我也在,演了三场就被国民党查禁了。演芦卡斯的宗晖同志被抓去,牺牲在雨花台。《卡门》是反暴政的,是革命戏。”

有了他这位既懂行、又敢于担风险的市委书记,《卡门》才和观众见面,这也

是解放后,这出世界名剧首次在中国演出。外地许多同行常对我们说:“重庆有任白戈当领导,你们真是幸福。”

难忘啊,难忘!任白戈在重庆工作期间,很重视抗建堂这个具有进步传统的上演话剧的场所。剧场的缺点是地处半山之中,观众有爬坡之苦。任白戈多次筹划解决办法,后来决定拆迁一些残旧的住房,使车辆可直达剧场门口,剧团和居民听到以后皆大欢喜。可惜,“大革文化的命”运动既起,计划成了泡影。而今之抗建堂,竟成了跳舞谋利场所!

难忘啊,难忘!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他第一次到重庆来,十年浩劫,致使他急骤地身衰体弱,步履维艰。他却清楚地记得许多同志,某某的普通话不够好呀!某某要多练功呀!对话剧团他还是说要抓创作。他见到川剧团的同志,十分关心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夕用巨款购置的衣箱尚在否?一九八四年,他来重庆走访了各个剧团,他乐天知命地说:“我收脚印来了,看看大家。”鼓励大家一定要把重庆的文艺工作搞上去。直到一九八五年雾季艺术节时,他看戏后仍然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,不因为他已不在其位而不谋其政。正因为他是文艺界人士的知心朋友,一见面仍侃侃而谈,或是或非都出自肺腑,情真意切,感人至深,令人难忘。

任白戈同志的逝世,我们在一个时期内虽有所闻,但终未见讣告,总不愿相信会是真的,因此未及参与吊唁,至为遗憾。话剧团曹明舒同志因公赴蓉赶上了与任白戈同志遗体告别仪式,他在会上写下了一句话:“任白戈同志永远活在重庆市话剧团同志心中。”这是足以代表我们心声的。



市委书记任白戈、夫人华逸接见《针锋相对》剧组
演员(右起)阎彬、熊宗敏、张荧、李远荣、汪振洲



我的选择

——写在建党七十周年纪念日前夕

□ 田晓东

春节前,妻弟一家从成都回来探亲,内侄见到我领取的工资时,不禁大为不解地说:“姑爹,您革命几十年,收入怎么跟我这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差不多呢?你们这些老革命硬是亏得很呀!”随后他又问我“您当初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?”是啊,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荆棘丛生、坎坷不平的道路呢?这就得从我的经历谈起。

我出生在一个世代贫苦的农民家里,深受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。我的祖父兄弟两个,祖父名叫田生富,二祖父叫田生贵,合起来就是“富贵荣华”的意思。我的父辈有四男二女,为讨吉利,也基本上都采用了帝王将相的名字。父亲田启颜,二叔田启光,三叔田启舜,四叔田启汤。然而命运并不以名字的好坏而改变,我的祖父兄弟二人都是大半辈子的长工,我的父辈四兄弟因家境贫寒、生活困难,除父亲成了亲外,其余三个叔叔都没有娶亲。我姐姐生下刚刚满月,生活迫使我们全家闯关东,来到了安市(现丹东市)。父亲不分白天黑夜地推鸡公车,母亲帮人洗衣服,竭尽全力,才勉强维持生活。1908年生下我以后,生活负担加重,日子就更难过了。为了糊口,母亲摊煎饼,姐姐烧开水来卖。从我记事起,就天天到火车站拾煤渣回来供她们用。记得七八岁时,一天我与几个

稍大点的伙伴儿偷偷跑到日本人开的煤厂去拣好点的煤渣，不幸被日本鬼子捉住了，他们把我们痛打一顿还不算，又提来一桶黑漆，涂在我们脸上，然后把我们关在黑屋子里一天多才放出来。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。后来，因为勤劳节俭，多少积蓄了点钱，父母亲带着我们又回到老家寿光县田柳庄。在安东，我亲眼目睹了工人和城市贫民们在官僚资本家残酷压迫下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；回到乡下，我又亲身体验到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剥削。旧中国那么黑暗，反动统治者那么腐败，穷人的希望在哪里呢？

1926年春天，与我村邻近的王高镇有位名叫王百灵的教书先生（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负责人）来到我们村，通过本村的朱云庆（也是教书先生），把我和其他六位同志召集在一起，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基本知识。他说，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推翻了沙皇统治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，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，穷人再也不受压迫不受剥削了。现在，我们中国人民正在遭受外国列强、国内的地主阶级和封建军阀的剥削压迫，劳动人民只有站起来，团结起来，同他们斗争，才有出头日子。他还告诉我们，中国也有了共产党，她就是带领老百姓同敌人作斗争的先锋队，你们可以争取参加这个组织。他还提出，要保密，对父母、子女都不能说，假如被敌人发现，绝不能出卖同志……琢磨着王百灵同志的话，我渐渐明白了，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；只有跟着共产党走，我们穷人才能翻身得到解放。于是，我毅然向党组织提出申请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经本村教师、地下党员朱云庆介绍，于1926年5月参加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，当时我才18岁。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，入党时，我第一次把名字田吉升改成了田吉庆。

回顾入党65年来的经历，我深深地认识到，一个人选择革命道路固然不易，然而要经受住革命斗争中的种种考验就更难了。在我革命生涯中，是有几个大的关键时期，可供选择的。

第一次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“4.12”反革命政变，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血腥镇压，革命转入低潮的时候。那时我入党刚一年，随后不久，我们支部的上级领导人也被捕了，支部于1928年暂时停止了活动。当时我是完全可以选择走务农或经商的道路的，然而我想到党的领导人告诉过我们，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，是为全国的老百姓翻身而奋斗的，要不怕牺牲个人的利益和性命。我决心坚持下去，于是就留在了村子里，而没到城里去。后来，大概1930年，有个李凤巢的教员又来我村活动，与朱云庆同志接上了关系。随着形势的好转，我们又组织起来活动，进行半公开的或秘密的斗争。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，我始终坚信党，坚信革命一定能胜利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又把名字由田吉庆改成了田晓东。

第二次是在1939年,我参加八路军后,母亲病故,部队领导给我一个月假回家料理后事。后来由于敌人封锁铁路极严,未能返回部队。这时,我也完全可以留在家务农、织布或做小生意,照顾年迈、孤独的老父亲的。但我想到,大敌当前,如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走,国都不存在了,哪还有家呢?我找到同在一个部队工作、又同在一个支部生活过的、当时寿光县委青救会会长宇平同志,后经县委批准,又在寿光县第七区委参加了地方革命工作。

第三次是1943年,我到垦利县七区(毛丝坨区)任区长。在初冬的一次为时21天的日寇进行的空前大扫荡中,我奉命率领区中队一个班的战士在黄河以北的荆条丛林里守护公粮。由于日伪军的合围,我不幸被捕了。敌人误以为我是老百姓,押着我去给他们扛弹药。我想万一被汉奸认出来的话,就会暴露组织,说不定会给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。我横下一条心,利用夜幕机智地逃了出来。在老百姓的帮助下,我顺利地躲过了日本小鬼子的几次搜查,保护了公粮。由于日寇反复的大扫荡,当时渤海根据地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,要坚持斗争实在不易。白天,我们冒着刺骨的寒风蹲荆条林,晚上摸到村里才能吃上点东西。我的家庭也不能幸免,日本鬼子把我家全部烧光,又用活埋来逼我父亲说出我的下落。后来在乡亲们的营救下,老人家才免于一死。在那样艰苦的斗争环境里,是革命必胜的信念支持了我,使我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。

第四次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动乱中,造反派说我是“假党员”,把我打成“反革命”、“走资派”,反复批斗我,以至有一次在杂技团把我整休克了。当时思想上的确有过困惑和彷徨,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执行了错误路线?也曾怀疑党是否还是我原来追求的党?我选择的道路是否错了?这些想法差点逼我走上自杀的道路。然而我终于还是挺过来了。我们伟大、英明的党,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,我才又重新出来工作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党又为我落实了政策。回顾这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,我体验到革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,革命的队伍也不是纯而又纯的。共产党员不是革命一时,而要革命一生,就要接受一生的考验。革命战争年代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是考验,“文革”中面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反革命集团的淫威是考验,和平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中还要经受名利、权利与金钱的考验,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期如何坚定信仰也是考验,而且新时期的考验并不比战争年代的考验轻松。

抚今思昔,我为当初自己的选择而感到自豪。我不后悔,也不觉得吃亏。我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,也不愿与他人攀比。孩子们已抚养成人,今后的路由他们自己去走了。与长眠于地下的先烈们相比,我是幸存者,党和政府给了我很高的荣誉,领导和同志们也为我安度晚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,我觉得欠党的太多,欠人